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史

第二卷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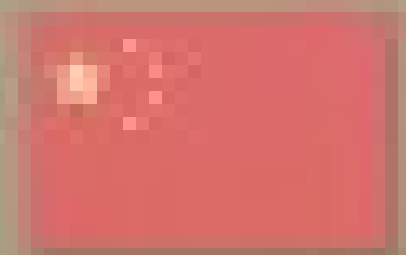
张静如 总主编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史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54年12月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文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史

第二卷

傅 颐 沈传宝 著
邢和明 李 林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 第2卷/张静如总主编;傅颐等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ISBN 978-7-5436-5768-7

I. 中... II. ①张...②傅... III. 中国-现代史-1949—2009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4062号

书 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2卷)

总 主 编 张静如

著 者 傅 颐 沈传宝 邢和明 李 林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李忠东 电话 (0532)85816241

特约编辑 陈 涛 徐 琨

封面设计 申 尧 程 皓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87mm×1092mm)

印 张 35.75

插 页 6

字 数 65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5768-7

定价(精) 68.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编委会

主 任 宋贵伦 张文启

总主编 张静如

委 员(按姓氏笔画)

卢颖华 孙大力 许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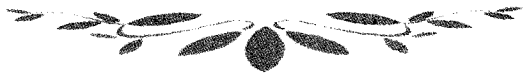
张 化 张文启 张树军

张静如 宋贵伦 辛国安

武国友 庞 松 柳建辉

郑 谦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1]
第一节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与探索的开端	[1]
第二节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9]
第三节 中共八大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5]
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	[46]
第二章 党的知识分子和文艺政策	[63]
第一节 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召开与知识分子的心声	[63]
第二节 “双百”方针与知识界的“春天”	[83]
第三章 从全党整风到反右派运动	[95]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初衷及其准备	[95]
第二节 整风运动与民主人士的意见	[98]
第三节 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	[111]
第四节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后果	[116]
第四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124]
第一节 “大跃进”的发动	[124]
第二节 农业“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39]
第三节 全民大炼钢铁	[162]
第五章 文化跃进与教育革命	[176]
第一节 文化界的跃进计划	[176]
第二节 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文艺创作	[182]

第三节	教育的“大办”与改革	[189]
第四节	科学领域的跃进	[197]
第五节	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99]
第六章	9个月的纠“左”	[205]
第一节	划清两个界线	[205]
第二节	整顿人民公社	[218]
第三节	稳住阵地再前进	[230]
第四节	不彻底的纠“左”努力	[245]
第七章	“反右倾”斗争与继续“大跃进”	[250]
第一节	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	[250]
第二节	开展“反右倾”斗争	[261]
第三节	“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	[273]
第八章	对国民经济及其他领域政策的全面调整	[290]
第一节	《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	[290]
第二节	调整方针的制定与贯彻	[302]
第三节	科学、教育及政治关系的初步调整	[313]
第四节	进一步调整的决策	[321]
第五节	大刀阔斧的调整与“责任田”风波	[331]
第六节	政治关系的继续调整	[337]
第七节	平定西藏武装叛乱与西藏、广西、宁夏自治区的成立	[343]
第九章	维护国家主权与对外关系的发展	[360]
第一节	第二次炮击金门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恢复	[361]
第二节	奉行睦邻友好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377]
第三节	中印边界的争端与武装冲突	[386]
第四节	争取两个“中间地带”与中法建交	[396]
第五节	对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作出反应:抗美援朝	[412]
第十章	从结盟到对抗:中苏关系的演变	[418]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合作	[418]

第二节	苏共二十大后出现分歧	[423]
第三节	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429]
第四节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与撕毁合同	[443]
第五节	中苏论战与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	[452]
第十一章	从继续调整中走出困境	[470]
第一节	“再用三年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其实施	[470]
第二节	以大庆油田和“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工业与科技发展	[476]
第三节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与“四个现代化”蓝图	[497]
第四节	精简职工与减少城镇人口	[504]
第五节	“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开局	[515]
第六节	试办托拉斯和劳动教育制度等体制改革的尝试	[523]
第七节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532]
第十二章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	[537]
第一节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与重提阶级斗争	[537]
第二节	“四清”和“五反”运动	[541]
第三节	党内的政治批判	[548]
第四节	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	[552]
第五节	批判“有鬼无害论”	[556]
第六节	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界的批判	[561]

第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第一节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与探索的开端

一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国是一个经济、科技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事实已经证明:中国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同样,搞建设也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号召向苏联学习。对此,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在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是,中国毕竟有自己的特点,苏联的方法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所以,毛泽东对学习苏联“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实际上,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了。1955 年 12 月—1956 年春,为准备中共八大的召开,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调查。1955 年 12 月—1956 年 3 月,刘少奇听取了中央 30 多个部门的汇报。接着,1956 年 2 月中旬—4 月下旬,毛泽东用 40 多天的时间分别听取了国务院 34 个

^①《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17 页,人民出版社,1999。

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作为这次调查的结果,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这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

毛泽东在听取 34 个部委汇报的过程中,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这次大会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次大会的积极作用在于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了斯大林的某些教条和僵化思想的束缚。于是,“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②所谓“引以为戒”,就是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所以,《论十大关系》的发表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1953 年同 1913 年相比,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20.43 倍,国民收入增长了 12.67 倍。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不仅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取得了巨大成绩。因此,苏联模式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如同苏联当初一样,需要在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化条件。同样的国情、同样的任务,苏联作为成功的先例,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自 1949 年 6 月以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先后访问过苏联,并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和农场,耳闻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更加坚定了学习苏联经验的信心。正如毛泽东出访苏联时所说的那样,他参观了苏联许多工厂和农场,看见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周恩来也发表过类似的讲话。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了学习苏联经验的群众运动。这种学习是多方面的: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又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既学习苏联如何建设工厂企业,又学习苏联开展文化建设的经验。总起来说,各行各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部门都在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或者改组,其中最为突出是经济和教育这两个部门。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72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②《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 页,人民出版社,1999。

就经济部门来看,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企业的建设和管理,基本上都是苏联那一套。工业、农业、商业都在学习和采用苏联的经验。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到各项具体政策的制定,从国家如何制订计划到中央和地方应该建立哪些经济管理部门以及如何管理,从建立财政金融制度到如何开展对外贸易,甚至连企业的设计、设备安装和农作物的管理方法,都以苏联为榜样。在那个年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全面学习苏联有什么不妥。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的一切都看作是先进的,不考虑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然而,在当时“一边倒”的形势下,这种意见受到了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是必要的,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存在着盲目性,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存在一定的迷信。苏联模式在它建立的初期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弊端逐渐地暴露出来。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同样,中国在模仿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也暴露出了弊端。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联模式进行认真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揭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不再迷信这一模式;其二,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从照搬苏联模式到批评这一模式的弊端,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这是因为:到1956年,中国已经搞了6年的建设,而这些建设又是在苏联帮助下进行的,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了解苏联的情况,并且觉察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关于这些情况,薄一波回顾说: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中共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①《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经验为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正如毛泽东所说,从1956年提出《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②事实证明,这个开端是良好的。

二 以苏为鉴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是以苏为鉴的结果。它首先探讨的是关于重工业、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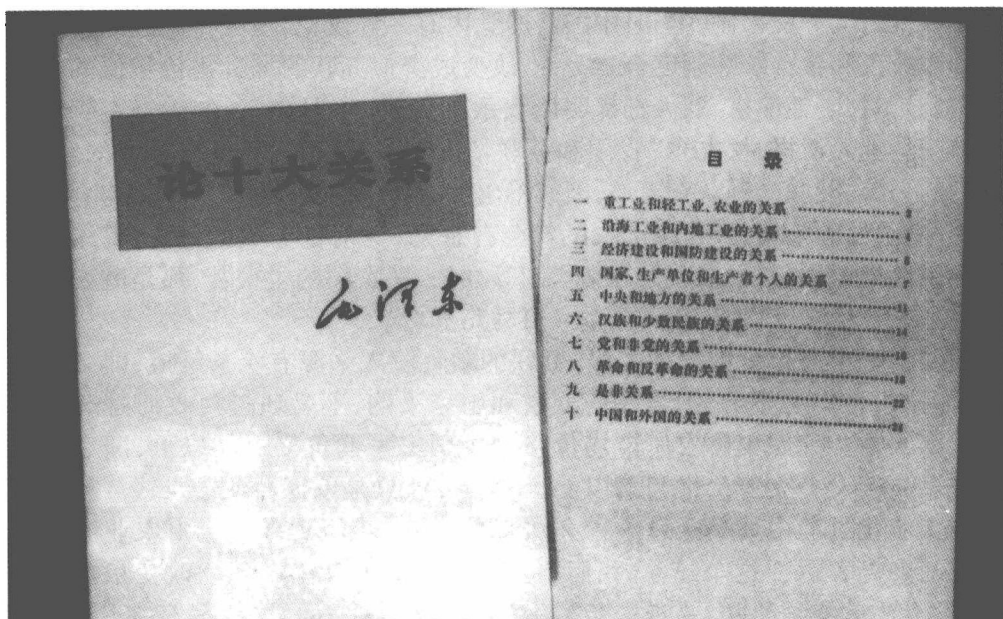
^②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走的是一条以发展重工业为重心的道路,它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苏联“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273%,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增长156%。到“二五”计划结束时,苏联轻工业年增长率为14.8%,重工业年增长率为19%,轻重工业比例进一步失调。至于粮食生产,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到“五五”计划前3年(1951—1953),苏联的农业计划指针1项也没有完成。1933—1940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低于1913年的水平。1939—1953年,苏联几乎所有农作物的年平均产量都低于1913年。如果按人均粮食产量计算,1953年比1913年要低10%。

对于苏联这种片面发展重工业、排挤轻工业和农业的畸形工业化道路,1956年4月18—24日以及4月25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中国则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毛泽东集中概括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图为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十大关系。



1976年12月公开出版的《论十大关系》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通过对苏联和中国发展工业的两种办法的比较,并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他还提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这两种办法中,毛泽东赞成后一种办法。^①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强调:鉴于苏联和中国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要更好地解决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即是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不能只顾一头。

1956年初,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初级社正大批地转向高级社。新的形势提出这样的问题:农业实现合作化后,农产品购销制度怎么办?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25页,人民出版社,1999。

要不要推行义务交售制？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种议论，主张将中国的公粮制度即农业税和粮食统购制度合二为一，改变成类似苏联的那种售价很低的义务交售制。对此，毛泽东、刘少奇都明确表示不赞成。1月2日，刘少奇在听取粮食部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我国和苏联情况不一样，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有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和征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征购粮就必须降价，农民就会有意见。”^①对于苏联的做法，毛泽东更是尖锐地批评说：苏联采取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那是既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据当时中国粮食部门的汇报，苏联的粮食收入来源有4条渠道，即义务交售、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国营农场上缴和国家采购，不是通过税收而是通过价格取得粮食。苏联集体农庄市场价格高于国家采购价格1倍以上，国家采购价格又高于义务交售价格两倍以上。义务交售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苏联在实行工业化过程中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来挖农民，从而实现资金由农业流向工业。刘少奇表示：“这个经验，我们不要去学。”实现合作化后，“改变粮食征购制度，不要单纯学苏联，要进一步研究”。^②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又作了详细阐述。他指出：由于片面注重重工业，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③他批评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④实际上，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同于苏联的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国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采取了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统购农产品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国家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模仿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①《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52页，1996。

②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75～276、48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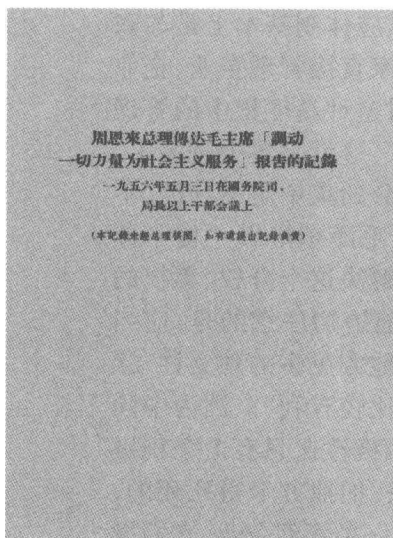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31页，人民出版社，1999。

尤其是工业体制、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建筑业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那一套。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国家直接管理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毛泽东在论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时,对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最近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①这种“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所以,毛泽东指出:“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②他认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一矛盾,“目前迫切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因为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所以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1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③他建议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另一类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去办,由地方自行去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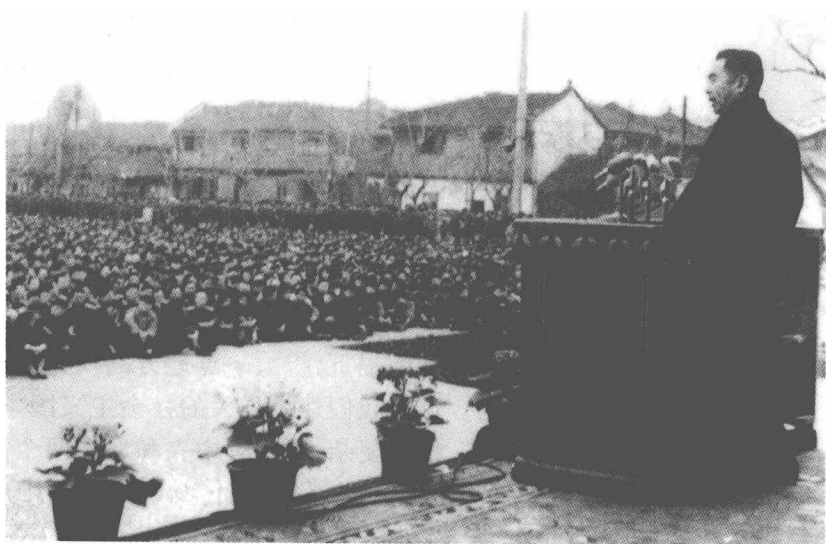
4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解释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问题。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他在讲话中还谈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注意分权也就是为了集权。二者也是辩证的,不是绝对的,否则就犯错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过分集中了”。^④5月3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司局级以上干部传达《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解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但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需要农业有很大的增长,才能适合人民的需要首先是生活上的需要,才能使我们国家很低的生活水平得以增长。而且,轻工业也需要由农业来供应原料,“这就使得我们对农业的发展应有足够的注意”。同时,轻工业也应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样一来,就可以“帮助积累资金,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对农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使农业发展不大”。战后,东欧国家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也有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引以为训,应很早注意。”^⑤

①②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52、31页,人民出版社,1999。

④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7~568、5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报告记录。



1957年3月，周恩来在杭州传达《论十大关系》。

关于共产党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在1936年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按照他的解释，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① 这种状况反映到政治体制上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并高度集权。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如果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该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但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并没有采用苏联的一党制，而是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也是与苏联政治体制不同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时讲得非常明确。他指出：在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8页，人民出版社，1979。

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①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又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在我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②为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共事,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尽管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中间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论十大关系》在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时,又强调这条路线在原则上和苏联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尤其是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没有真正突破苏联工业化模式,结果在“大跃进”运动中继续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以钢为纲,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致使市场供应紧张,日用品和粮食缺乏。不可否认,《论十大关系》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它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向全党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节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一 批评“右倾保守思想”与冒进倾向的产生

中国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是相当低的。旧中国留下来的近代工业只有10%,小农经济占了绝大多数,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中国当时的国情是最恰当不过了,而这正是毛泽东追求一种高速度的根据。他在听取各部委的工作汇报时说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他还拿当时世界上两个工业强国作比较说: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时也是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35页,人民出版社,1999。